

先做人再演戏

□刘金祥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剧照

“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这封信，既是对牛犇德艺双馨的褒扬和赞誉，也是对广大影视艺术工作者加强艺德建设的期许与鞭策。艺德，顾名思义是指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品德，是演艺人员的职业操守，是衡量其品行高下的根本尺度；艺德建设通俗地讲就是“欲从艺、先立德”，“以艺为重、以德为先”，具体是指包括影视演员在内的一切艺术工作者，应注重艺术修养和人格修为的磨砺与锤炼。影视队伍中诸多“演技高超而为人低调”的“老戏骨”的高风亮节着实令人敬佩，而某些一味追求颜值的“小鲜肉”们的急功近利却让人大跌眼镜，众多专家学者和广大观众对当下年轻一代影视演员艺术品德下滑表示深深担忧，一些舆论界知名人士甚至直陈痛斥个别影视大咖的败德劣行，郑重指出由于某些青年演员的素质低下和艺德缺失，正在损毁乃至断送中国影视艺术的鲜亮前景。影视艺术原理表明，演员素质绝非单纯地指表演创作方面的审美素养，更包括由思想道德和职业操守构成的艺术品德。作为从事造型艺术的社会公众人物，影视演员的艺术品德是影视艺术“生命有机体”的重要质素，不仅对于包括影视在内的整个文艺事业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于涵育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乃至良好社会风尚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影视艺术是由多门类艺术群体共同创造的，既融合了现代科技与表演艺术的最新成果，又吸纳了传统戏剧艺术长期积累的精华所在，最终凝结成为一个完美统一的艺术品种。在这一综合体中，不同个体之间应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围绕着塑造为观众所接受的荧屏人物形象这一中心而各专其责、各司其职，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群体、每个个体的聪明才智和优势专长，共同完成影视艺术的最终表现形式——电影电视作品。影视艺术创造活动的这种本质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以人性、信念感和大局观为旨规和统摄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应当成为影视演员自觉恪守的法度与规矩。毋庸置疑，没有或者破坏了影视艺术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建立健全影视艺术的科学运行机制，更不可能创造出富有新意的造型艺术，最终将难以实现影视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从影视艺术的中心要素——表演创造的特殊性来说，影视演员的艺术品德也是荧屏形象创造材料的重要构成要素，影视艺术最明显的特征或者说与戏剧等其他造型艺术的最大区别，就是影视演员的思想、感情、心境是荧屏艺术形象的直接材料，换言之，影视演员的全部精神面貌必须毫无保留地注入到荧屏人物形象中，这是任何表演技巧都难以替代和无法掩饰的，毕竟影视演员所表现的人物形象，是经过艺术家体验和评价过的生活感受，尽管各自身份、角色和手段不同，但都须经艺术家美丑观的过滤和是非观的审视，在此基础上，影视演员再用心灵去体会、用技巧去体现、用样貌

去展示。

二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0多年来，我国影视界的观念、体制和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影视演员的热情和潜能得到充分释放，文化艺术生产力得到了深度解放。在看到我国影视作品数量大幅激增、全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的同时，我们不应忽略部分影视演员艺术品德每况愈下的客观事实。尽管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影视演员队伍的职业道德面貌其主流是健康良好的，并且涌现出一大批德艺双馨演员，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神采卓然、风标自立的银幕、荧屏艺术形象。然而，由于受西方价值观和市场经济金钱至上论的影响，近年来很多青年影视演员漠视道德、背弃情怀、抛却担当，向“庸俗、低俗、媚俗”俯首垂眉，更有少数红得发紫的影视大腕为了金钱，毫无廉耻，或投机取巧、粗制滥造、自我炒作、沽名钓誉，或追求奢华、炫富摆阔、声色犬马、好逸恶劳，或偷税漏税、瞒报收入、吸毒涉赌、招嫖纳妓，上演着一出出冲击法律律条、践踏道德底线的丑态恶行，在很大程度上污染了影视演艺界生态，导致影视娱乐界藏污纳垢、乱象滋生，严重损害了影视演员队伍的整体形象，以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动用立法手段规范包括影视演员在内的劣迹艺人的职业道德，中宣部等五部局采取联合发文措施整治影视演员的不良道德行为，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文件对部分影视演员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和偷税漏税等无良行为进行治理和约束。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发问：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作为

公众人物，影视演员的言行对人们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审美习惯、价值取向、人格养成，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和引导功能。他们一旦被爆出违法失德事件，必定会成为社会舆论焦点，必然会对受众带来负面影响。当下，部分影视演员素质下降以及艺德丧失，虽然尚未湮没中坚力量锐意进取这一主流，但也早已成为被社会各界指责、被广大观众诟病的突出现象，在这一突出现象中，影视演员艺德大面积沦落是最为明显的问题。影视演员艺德建设作为艺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是影视事业基础性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影视主管部门虽然注重加强艺术管理的研究和思考，但大多停留在院团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方面，对于影视演员的艺德建设则很少顾及。当下影视演员艺德素养的滑坡，造成这种状况最深刻最根本的原因，源于西方价值观的大举入侵、甚嚣尘上，源于少数影视明星私欲极度膨胀和影视界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扩张蔓延，源于个别管理部门对某些影视演员违法犯罪、丑闻劣迹的视而不见甚至姑息纵容。我国当前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的价值观和多样化的社会理念，一方面扩展了人们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也模糊了人们基本的道德判断，传统价值观不断被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吞噬

践，形成了关于艺术与道德本质内涵、艺术形式与道德理念、艺术教育与道德教化、艺术创作研习与个体道德修养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艺德观，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与实践价值。我国影视演员艺德观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戏曲传统，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影视艺术发展中进一步推陈出新，是与社会主义道德观有机统一、高度契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影视演员艺德观涵纳的意识形态属性是社会主义的，既是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赓续，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影视艺术工作者的社会主义道德修养在专业活动中的自觉流露与自发展现。我认为影视演员艺德建设至少涵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公德”与“私德”相统一。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启迪人们思想、温润人们心灵、熏染人们情趣、陶冶人们生活，能够拂去社会上的萎靡之风、消除生活中的颓废之音。这就要求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影视演员，要把握和处理好“公德”与“私德”的关系，敞开胸襟，放大格局，心系天下，情牵苍生，充分认识新时代赋予的神圣职责与光荣使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刻苦自强，勤笃自励，在艺术创作上追求卓越和永恒，在道德修养上追求超拔与高远，把核心价值观生动鲜活地体现在自己影视创作实践中，用高迈清朗的人物形象引导广大观众崇善抑恶、扬清激浊，自觉地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不断向“德艺双馨”标准聚首和靠拢。

第二，“艺品”与“人品”相融汇。我国传统戏德观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注重“艺品”与“人品”的二位一体、相互融汇，把为人和从艺看作互融互鉴、相得益彰的道德理想。牛犇等优秀影视表演艺术家，不仅自身具有优良艺术美德和精湛艺术才华，而且其作品在给观众带来快乐娱乐的同时，也给予观众思想美德的教化和熏染。“山有云树，方显巍峨之风；云系山间，才有飘逸之姿。”品德与技艺的关系亦如此。倡导在做人上大节公德、正直善良，主张在从艺上精益求精、尽善尽美，这种慎于做人、严于从艺的传统戏德优良素质，应当成为当代影视演员加强艺术品德建设的核心要义。无论何时何地，影视演员都要先做人再演戏，坚守艺术理想、艺术良知和职业操守，弘扬戏比天大的传统美德，恪守敬业乐群的职业道德，努力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第三，“情怀”与“情趣”相协调。影视艺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其根基在于人民群众，其源泉在于现实生活，其生命在于观众需要。广大人民群众从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脱贫、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和创新社会治理等实践活动，这些都是蕴含着新时代影视艺术原料的丰富矿藏。影视演员要牢固树立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以真诚的人民情怀展现人民群众的奋斗足迹和创造身影。要把握和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志存高远，淡泊名利，守正律己，甘于奉献，摒弃庸俗价值观的侵蚀和渗透，让个人情趣、一己情调服从服务于人民情怀、大众情感，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把净化演出生态作为要务，最大限度地摆脱商业行为和名利羁绊，全身心投入到影视艺术事业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努力成为像牛犇等一样的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影视艺术工作者。



《嘿，老头》剧照

消解，社会生活中某些人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以戏谑为崇高，这无疑为一些青年影视演员行为失范提供了现实土壤。德国哲学家康德说：“道德责任是以自觉自愿地承担为最高境界的。”可见，无论是法律令还是经济合同，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要从根本上减少甚至杜绝劣迹影视艺人的出现，还得依靠加强影视演员艺术品德建设。因此，越是在各种价值取向激烈冲突之际，越要格外地强调艺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德艺双馨的重要性。

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形成的各种职业道德观，与其社会总体道德观一样，都具有文化继承性和时代更新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艺”、“德”关系的阐释与实

从“粤港澳大湾区劳动者文学”说开去

□丁 燕



“粤港澳大湾区”是个新概念，是将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中山、肇庆、江门、惠州等城市组成城市群，是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比肩；“劳动者文学”应是描写劳动者生活和情感的文学，“劳动者”是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凡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劳动获取合法收入作为生活来源的公民皆可称之为“劳动者”。如此，无论是工人、农民、渔民、知识分子、公务员和手工业者，都是劳动者。

在我看来，还有另外两个词站立在这个组合名词的背后的——岭南文化和移民。

“岭南亲海，热带民风”。千百年来，岭南文化为华夏长卷增添了绚丽篇章；及至近代，岭南又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生活最炽热的漩涡地带。然，国人对秦岭的研究远远超过五岭，所以导致大部分中原人对这片被称为“岭南”的地方，包括广东、广西、香港、澳门和海南，感到非常陌生。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就是岭南这片区域中最耀眼的珍珠。

近40年来，生活在岭南的人口，和生活在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不大相同。拿东莞为例：这里生活着近800万人口（通过手机持有者来推测），可拥有东莞户籍者仅为200万，其余600万为移民。在这些移民中，有的最终成为市民定居了下来，有的则在打工多年后，迁往别处或重返老家。这

样一群非本地户籍者，也应算这里的劳动者，他们的贡献亦不应被淡化。

2010年8月，当我从新疆南迁至广东，写作风格发生了很大改变，从抒情诗歌转向纪实类创作。作为一个在沙漠边缘长大的人，陡然来到海边，那种震撼与不适是极为强烈的。海里充满了无止尽的水，喧哗奔腾的水。海啸时躲避到山里的行为，当地人叫“逃水”。可见，“水”有时意味着灾难。定居东莞8年后，我终于发现，岭南人的灵活多变是被环境逼出来的，面对大海，谁能不心生畏惧。江湖到了此处已是尽头，唯有灵活多变才能自救。而在这样一片区域中诞生的文学，自然有别于中原、西北和江南等地。

岭南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既不像大陆那般坚实恒定，也不像海洋那般四面孤悬，而兼具大陆和海洋的双重气质。这里的河流会因海浪的潮汐而倒流，其水的滋味时咸时淡。这里总处于变化之中，所以这里的人们早已习惯跌宕与喧嚣。由于背山负水、远隔中原、无所依傍、环境恶劣，更由于人口的多元结构，岭南文化呈现出感性化、商业化、世俗化、非正统化的特点；而岭南人的性格，则表现为创新与务实，包容与灵活。

和中原人肯定一个人“忠厚老实”相反，岭南人信奉一种“精明哲学”、“精明”一词和“老板娘”一样，都带有褒义，除去利益计较外，多赞其顺应环境做事融通，人际关系方面圆润通达。在北

方，人们可以“一条路走到黑”，因为地上有路；而在南方，出门就是海。航海时发现不对便要即刻变通，否则性命难保。故而，无论是社会实践还是生活实践，“变通”已形成了一种岭南文化。

2018年春天的某个黄昏，我在蔡白湿地公园散步。趁着黄昏的薄雾，穿过一条坑洼的水泥板小路时，我愣怔住。从路边的菜地里蒸腾出一股味道，混合了泥土、蔬菜和肥料的味道陡然撞击到我的鼻孔。“和我小时候闻的味一模一样啊。”甚至这种场景：一排农民房外是一大片菜地，还有那竹竿、塑料薄膜、杂草，以及黏糊在路面的泥浆，除了那排农民房不是黄泥土屋，除了站在门口的女孩不是自己。

那个瞬间，我想起了我的家：新疆哈密市东菜园村的一个有着葡萄架的平房小院，木门外就是一大片菜地，地里总是插着竹竿，绑着豇豆；而塑料薄膜是用来培育菜苗的。

我的内心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我迁徙5000公里后的居住地，是一个和我的出生地极为相似的地方，那我又何必大动干戈地搬迁？我并不是一个热爱都市的人，但同时，我也并不留恋乡村。在评价某些作家的作品时，我喜欢用“土”字来形容，但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洋”。我是用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发现了这个秘密——我是一个具有城乡结合地带气质的写作者。在我的身上，有前卫时尚的元素，但淳朴的田园是我的底色。进而，我慢慢地发现，我所居

住的城市东莞，其实也是个具有城乡结合地带气质的城市。

东莞是一个正在变成城市的城市；目前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一大批人，是努力从农民变成市民的人。一切都在进行中，一切都尚未定型，一切都处于多种可能性之中。每一类人群都能提供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在本地土著人眼中的东莞，和写字楼白领眼中的东莞，都是一系列自我反射式符号的组合，它们都首先指涉其自身，再由此来命名城市。

当我们试图通过观察人群来洞察城市时，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人群？记得最初抵达东莞樟木头镇时，看到身穿工装手拿饭盒边走边吃的人群时，我的心怦然一动。我被这群人深深吸引。每一位来到东莞的人，来了就都想尽办法成就自己，重塑自己，用自己的创造力来改变这座城市，使自己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东莞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舞台。

2012年，当我进入樟木头镇的电子厂打工后，惊诧地发现，在这个世界里，情感是不计算在内的。当大批农民工离开家乡来到工厂后，他们按《劳动法》的规定拿到了工资。工资的计算已精确到小数点之后两位数，但情感的损失却是统计报表忽略不计的。大批农民工长期无法和自己的老人孩子一起生活。即便寄去的金钱可维持这个家的基本运转，但因长年分离，人们内心的情感已异常干枯。而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大地比比皆是；而这样的情感缺失，在几乎所有的人看来，都是应该的、必须的和必然的。

在表现工厂生活时，除了表现工人和用工单位的对抗这一主题外，还有一大片领域没有涉及。事实上，关注情感和关注发展不平衡一样重要。在创作《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和《工厂爱情》时，我尽量避免用二元对立的目光打量工厂，努力呈现出关于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在我看来，人类是富有情感的动物，情感在生活中十分重要。

在中国，经常能听到这样一个论调：北方是“土”的文化，南方是“海”的文化。当我从新疆迁居广东后，对这个论调产生了强烈怀疑。因为我感觉我所出生并成长的西北，算不上“土”

的文化，而更倾向于“沙”的文化，因为我的视线里很少出现黄土高原，而主要是沙漠戈壁。虽然我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既定论调的粗糙，然而每当我试图申辩时，总会结结巴巴，于是，我便选择了沉默。

然而，在创作“工厂三部曲”时，我又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每当写作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思考时，我发现我的目光底部总是沙漠而非黄土。工厂是中性的，它就伫立在那里。如果用黄土高原的农民思维来观察工厂，很容易将它看成是一个反面例证；而如果用绿洲牧民的思维来考察，会看到更多的深意。也许关于写作的秘密，就在那一刻的醒悟：我发现自己的眼神总是溢出理论，总能看到更多；而这些更多，则是沙漠对我的馈赠。

关于西北“沙”的特征，并非我在新疆时发现的，而是我迁徙到南海边后，在日复一日的高温、暴雨和潮汐中逐渐廓清的。我发现其实我拥有两双眼睛，面对一幅看起来很简单的图景，我总能显影出更复杂更详细的内容。譬如，当我表示我不会跳舞时，对方总是惊讶地瞪大眼睛：“你不是新疆人吗？”我再次变得结结巴巴。另一个反面例证是当我到东莞细村市场买鱼时，询问摊主这是什么鱼，他说是小鱼。后来，有个本地朋友告诉我，东莞人称呼鱼的词汇太丰富，但绝大多数名称无法用普通话来表达，所以卖鱼人就用“小鱼”来简而化之。我惊诧地发现，原来沉默是双方的。当我放弃了向对方解释时，对方同时亦放弃向我解释，而当这种沉默让多元化消失后，生活便会变得简单而粗糙。

如何书写岭南，如何书写岭南的劳动者，还得回到个体，从自己的内心开始探寻。我发现自己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表面上，我还是原来的那个人，但内心已发生了改变，就像盐溶解于白水，我已和此前完全不同。在大幅度的地理移动，剧烈的文化冲撞中，我发现我自己变得勇敢起来。当我试图走出困扰自己的外壳时，不再害怕受伤，因我已丧失了太多。而一旦我迈出原来的自我，我便看到了周围事物簇新的轮廓，也看到了簇新的自己。